

云南古代白子国(白国)考释

□吴光范



《南诏图传》中的张乐进求图及题字

云南历史上的白子国(白国),起自汉末,迄于唐贞观年间,是巍山和白崖(今弥渡红岩)一带的方国,后为南诏蒙氏取代。白子国的起始时间、建都地点、治理范围等问题,曾各执一词,众说纷纭,本文尝试对史料中关于白子国“起自周代”“建都激江”和“奄有全滇”等几个问题进行分析考释。

历史文献证明曾有白子国(白国)

白子国(白国)之名,首见于唐代南诏中兴二年(公元899年)绘制的《南诏史画卷》(亦称《南诏图卷》《南诏图传》《南诏中兴国史画卷》)之绘画和题字的记载,它是研究白子国(白国)情况和南诏历史、宗教、官制、生产、民俗、服饰、艺术等方面情况的珍贵资料。此画卷原藏清宫,上有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成亲王题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南诏图传》被劫,后流入日本,现藏于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

《南诏图传》的题字中,有3处提到张乐进求:“云南大将军张乐进求”“云南国诏西二河侯前拜大首领将军张乐进求”“白崖进求张化(氏)”,且明示张乐进求为白崖“云南国诏西二河侯”,即三国蜀汉时设云南郡西二河“云南国诏”。

方国瑜教授著《滇史论丛·有关南诏史料的问题》(之四)载:“张乐进求的故事,最早记载者为南诏中兴三年(公元898年)画卷题字作……《南诏野史》说:‘诸葛亮侯封白子国龙佑那为首长,赐姓张氏。……至十世孙张乐进求,唐太宗己酉(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封为大首领大将军,后见蒙舍川蒙细奴罗有奇象,遂娶以女,遂国与之。’按:所说诸葛亮初封张龙佑那,据《三国志·蜀志·后主传》,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置云南郡。自西汉以来,统治西南的政策,土流并举,任命太守,同时封土长为王侯,设益州郡封滇王,设牂牁郡封夜郎王,设永昌郡封哀牢王,则新设云南郡封土长王号是很可能的。因为这是羁縻政权地区的社会基础所决定的。疑张氏初受封为云南王后,自称为云

南国诏。……李京《云南志略》说:‘张乐进求为蒙氏所灭’,应是事实,而传说为逊位。大抵史籍纪录与《白古通》系地方记载互有详略,相得益彰,虽史料有不足之处,惟事属可能,不是后人虚构的空中楼阁,也不致‘现在还没有发现很好的可以解释此事的材料’(向达语)。”

从宋代至清代,有多种史料记载白子国(白国)史事,如宋代王钦若、杨亿等人撰《册府元龟》,元代李京撰《云南志略》,张道宗撰《纪古滇说集》,明代杨慎撰《滇载记》,陈文撰《景泰云南图经志》,周季凤撰《正德云南志》、谢肇淛撰《滇略》、毛奇龄撰《蛮司志》,清代顾炎武撰《肇城志》、顾祖禹撰《读史方輿记要》、倪格集《南诏野史》和《滇小记》附录《白国因由》、冯甦撰《滇考》等,都有关于白子国(白国)的记载。其中顾祖禹撰《读史方輿记要》卷一百一十三载:“《白虎通》:战国时,楚庄踞滇,号为庄氏;汉元狩间,庄氏后有尝羌者,与白崖王争衡,武帝乃立白人仁果为滇王,而踞嗣绝。仁果传十五代为龙祐那,当蜀汉建兴六年,诸葛亮武侯南征,师次白崖,立为首长,赐姓张氏,遂世据云南,或称昆弥国,或称白国,或称建宁国。历十七代,当唐贞观世,张乐进求以蒙舍酋细奴罗强,遂逊位焉。”

这些记载中,张乐进求或逊位于细奴罗,或让位于细奴逻,还记载了其姓氏更迭:“蜀汉尝官其首长龙佑那,赐姓张氏,其既选有著姓,龙蒙氏、郭氏、赵氏、杨氏、段氏、高氏凡七姓。”各种文献虽说法不尽一致,但相同的是:南诏前有白国,汉末张仁果、蜀汉龙祐那、唐时张乐进求,为白国酋长或称国诏,唐贞观时为南诏细奴逻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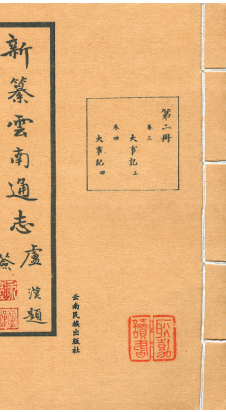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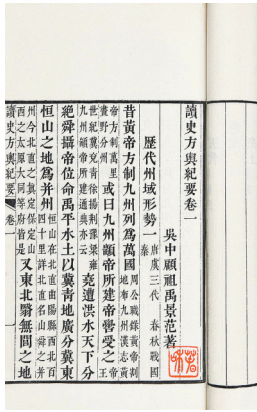
白族语地名印证白子国(白国)

恩格斯在《法兰克方言》中,曾通过对地名“活化石”的分析,论断阿勒曼尼人曾在法兰克人之前占领过的地方,他们也试图通过对云南历史文献和地名“活化石”的分析,揭示南诏之前有白国(白子国)。

《剑川县地名志》载:剑川县东岭



增订《南诏野史》



云南民族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新纂云南通志》第二册

区庆华乡备马场,在黄蜂场村西南2公里,山区,白语意为白子国王曾在此整队休息,备马登程。该书还记载:“剑川县东岭区庆华乡格子箐,在黄蜂场村北2.5公里,山区。‘格子’为白语‘估子’变音,意为上坡;相传昔年白子国王率马队在此歇宿,出发时国王传令‘估子’,随军史令遂将‘估子’二字记为该地名。后误作‘格子’,沿用至今。”“随军史令”当是白子国随军的史官,负责记载白子国国王政令的记录、地名的命名。

白子国(白国)的上限和下限

白子国(白国)之上限,有周代和汉末两种观点。

一说起于周代。元代张道宗撰《纪古滇说集》和清代倪格集《南诏野史》记载,周宣王时,西南有身尊国(即天竺国),阿育王第八子蒙苴頊,居大理白崖,以地名作国名,号白国。这一记载把白子国(白国)的历史提前至周朝,如是信史,则可从;但此说均把天竺国摩耶提国阿育王“人称为白饭王”这一神话人物说成“白国之鼻祖”或说蒙苴頊为大白国之首王为“阿育王第八子”,均系元代及以后之神话传说,不可从。

一说起自汉末。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载:“初,蛮酋张氏名仁果,时当汉末。”林超民教授《白子国考》说:子国是由樊人于东汉末年在洱海地区建立起来的,直到唐代贞观年间被蒙舍诏并灭;自樊道县(今四川宜宾)西迁至洱海地区的樊人,被《华阳国志》称为下方夷,他们以白崖为中心,形成一个较大的酋邦,这就是白子国。此说,白子国起自东汉末年,于史有据,可从。

白子国(白国)之下限,通常认为是唐代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按方国瑜先生引《新唐书·南蛮传》《册府元龟》《纪古滇说集》:“唐

册封张乐进求为大首领大将军,受封盖在贞观二十三年。”……李京《云南志略》说:‘张乐进求为蒙氏所灭’,应是事实,而传说为逊位。”即张乐进求受封为大首领大将军并于当年逊位或灭亡于南诏细奴逻,则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为白子国(白国)之下限。

张仁果(汉末,公元195年)——龙佑那(三国蜀汉诸葛武侯册封、赐姓)——张乐进求(受封于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张氏从仁果至张乐进求共延续33代、约500多年,比南诏蒙氏和大理国历史都长。另外也有史料说,从西汉时“册张仁果为滇王”算起,白子国(白国)历700多年。但《新纂云南通志》对此存疑,且元、明以前无此记载。

白子国(白国)“建都激江”辨析

清代倪格集《南诏野史》载:“建宁国:张氏国号,汉末祖张仁果,居蒙舍川,昆明大族众立为王,建都激江,号云南王。”此记载说白子国(白国)的都城在激江。

但根据《激江县地名志》载:激江“汉为俞元县,属益州郡。晋属建宁郡、兴古郡。属属益州。唐武德元年置南宁州,武德七年置西宁州。……宋大理段氏为罗加部。……至元十三年(1276年)升为激江路(激江之名始此)。”由此可知,激江之名始于元代,汉为俞元县,尚无激江之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倪格:“汉末祖张仁果……建都激江”之说,于史不符,不可从。

白子国(白国)“奄有全滇”辨析

元代张道宗撰《纪古滇说集》关于白子国(白国)的缘由记载,文意前后抵牾,不能自圆其说。方国瑜先生在《纪古滇说集·概说》直评其“所载大都神话传说,史实甚少。有见于《白国因由》者,如哀牢国摩梨羌故事、习农乐故事、阿颺观音故事,大概与《白国因由》第七至第十所载相同,录于阿育王三子故事之间。又以传说神话掺杂《史记》《两汉》之文。且割裂史实,颠倒错乱,以致不可究诘……按王崧《道光志抄》卷三《封建志序》曰:

‘《纪古滇说》支离杂沓,乃好事者所妄造’,不足为典要也。……以证史则未必可取也。”

白国(白子国)的范围“奄有全滇”之说,起于明代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白国始末》条载:“汉元狩间,庄豪治滇,仁果治白崖,两国角立。帝嘉仁果为众所戴,以玉印册之为滇王,遂奄有全滇之地,豪世遂绝。”但这一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滇东北至滇中,自晋至隋,长期为爨氏大姓统治区,不是白子国(白国)“奄有全滇”之区。(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载:“唐高祖命(爨)宏达为昆州刺史、太宗命(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其族其地沿晋、宋、齐、梁、北魏、周、隋之,故殆所谓‘闭门天子,开门节度’……夫数千里之地而爨氏梁后有权力主持之,发源于汉末,割据于梁后,乱亡于唐开元时。”

滇西哀牢(今保山、德宏一带)、滇南句町(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等地)和唐初南诏之外其他五诏之地,皆不是白国(白子国)“奄有全滇”之区。

如果白子国(白国)“奄有全滇”,接替它的南诏一开始就应“奄有全滇”,但实际上南诏初期只是据有洱海地区巍山至白崖一带之地。这也反过来证明白子国实际控制地区只是洱海地区巍山至白崖一带之地。

方国瑜教授《滇史论丛》载:“如前所述,南诏蒙氏以前有白子国,南诏继承了白子国的文化得到更大发展。《白古通记》系记载洱海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有根据的……但必须指出,《白古通记》系的史料为‘儒释’所窜改附会,又经元、明人窜改错杂,不唯许多事是子虚乌有,而且错误也多,一定要经过耐心考校才能利用,但千万不能以此全盘否定。”方国瑜先生的这一辨析,既否定了《白古通记》为“空中楼阁”之论,又指出《纪古滇说集》等“割裂史实,颠倒错乱……乃好事者所妄造……以证史则未必可取也”。方国瑜先生对历史文献实事求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持扬弃的科学精神,感人至深,启迪后人。

(作者地址: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 云南故事

红雨随心翻作浪

——陆良县70年水利建设小史

□杨辅



1978年陆良开挖新南盘江场景



陆良万人会战水利建设

陆良坝子是云南第一大坝子,是全省的主要产粮区之一。由于历史上水利建设严重缺失,大多数农田只能靠天吃饭。新中国成立之初有这样一首民谣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陆良,陆良,平坝无水最荒凉。忽然一夜盘江雨,旱地成河田成江。”史料记载: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陆良县粮食平均亩产约150斤,其中水稻亩产180斤,包谷亩产120斤,蚕豆亩产100斤,小麦亩产140斤,粮食生产水平极低。

中国共产党有重视农业水利建设的优良传统。早在1934年1月23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就作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就应予以极大的注意”这一著名论断(《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我们的经济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整治山河,兴起大修水利热潮,陆良县委、县政府对陆良实际,提出“上段蓄水、中段围圩和抽水排涝改造荒海,下段作滩排阻、畅通泄水”的根治南盘江方案。其中麦子河水库既是新中国成立后陆良兴建的第一座水库,又是当时全省中型水库建设的试点工程。麦子河水库施工期间,省水利局组织地(州)、县水利部门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前来参观指导、学习。曲靖、沾益两县出动民工1800余人参与协作修水库。山遥路远的嵩明县亦出动马车参加运输。来自四面八方的水利建设大军,又一次亲身感受到新中国改天换地的壮举。工地上施工人数最多时达12017人,上坝土方51万立方米。当时工地上缺乏电力,坝体的碾压靠的是人力操作的3.7吨的羊

角碾,100-120公斤的石碾和40公斤的铁飞碾。工程施工虽然又苦又累,但获得翻身解放的农民群众热情高涨,干劲十足。

麦子河水库工程经过近8个月的奋战,像蚂蚁搬泰山一般,筑起了一道高21.2米,顶长670米的均质土坝。水库设计库容1350万立方米,1956年开始蓄水。1957年春耕时节,陆良县马街、环城两个受益地区,再不用等天下雨就可以栽秧。麦子河水库的现实成效,更加激励了全县干部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

从此,陆良在“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兴修水利”方针的指引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兴修水利高潮,年年规划,年年兴建:1958年修建中型蓄水库工程板桥河水库,又在南盘江上筑起石坝拦水——响水坝水库;1959年、1960年兴修大型水库独木水库(后划归曲靖县管辖);1960年至1961年,排灌中原泽(陆良海)和旧州海等10几个荒海,开垦良田10余万亩。1971年至1972年

修建中型水库永清河水库;1972年至1976年修建莲花水库。至1976年,陆良全县共兴修大型水库1件、中型水库5件、小(一)型水库18件、小(二)型水库72件。这些成就,使陆良县步入“云南省兴修水利先进县”行列。陆良县连续20多年的水利建设,其规模之大,效益之高,前无古人,后启来者。至1976年,陆良坝子已变成沟渠纵横,山区半山区人工“湖”星罗棋布,有诗赞曰:“深山现明珠,坝间锁蛟龙”。

炸开西桥石滩,是陆良水利建设史上的“持久战”。史载:1929年,县长熊从周(中共地下党员)为减轻陆良洪涝灾害,向省政府数次申请,经批准由建设厅拨发滇币5万元,当年西桥作滩首次开工。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县委、县政府都十分重视炸开西桥滩阻问题。从1955年开始,每年2至4月枯水季节,则组织数千工人进驻西桥滩施工,至1977年,炮声在这条河床里轰鸣了22个冬春,终于炸开了从油虾洞至五眼洞全长9.21公里,平均炸

深2.5米、宽50米的石滩河床。省水利厅专家评价:“就炸滩而言,陆良县的西桥滩开炸,战线之长,年代之久远,在云南水利史上是罕见的。”

1976年,陆良县委、县政府根据老盘江湾道太多,流水不畅及1973年、1976年洪水倒圩泛滥成灾的教训,作出“丢掉老盘江,开挖新盘江”的决定。

1977年11月25日,全县9个公社的干部、社员和县机关干部职工、工人及当地驻军空军部队,共5万余人开始进行“根治南盘江”水利建设,每天都有四五万人出工开挖新盘江,最多时达6万余人,工地沿线数万人头攒动,千杆红旗飘扬,蔚为壮观。经过半年多的大干苦干,至1978年5月,一条长25.3公里、江口宽70米、底宽45米、平均深6米的新盘江,像一条玉带般环绕在陆良坝子里,比老盘江缩短13公里。新盘江上建起节制闸3座,各类桥梁23道,渡槽5座,抽水排灌站68道。从此,陆良境内的南盘江段,彻底根治了洪水泛滥,新增10

余万亩农田实现旱涝保收。新南盘江像一条玉带般展现在陆良坝子里,使陆良良田更加壮美。

1979年春,陆良县委、政府在县城南门外新开的河道里召开庆祝大会,主席台两侧有这样一副对联:“新盘江,庆通水,淌走一穷二白;陆良坝,闹春耕,迎来万紫千红。”

新中国成立后20余年的水利建设,改变了陆良农业生产面貌,再加上“农业八字宪法”的贯彻实施,至1977年全县21万亩水田,已有17万亩实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1977年水稻平均亩产达756斤,三岔河等地大量水田,水稻亩产已超过1000余斤,建成“吨粮田”。全县粮食产量极大增加,仅1978年,陆良县就调出粮食3641万斤,极大地支援了国家建设,之后每年都有粮食调出,陆良真正成为“滇东粮仓”。

改革开放以来,陆良县的水利工程在持续发挥作用,粮食生产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成效显著,“滇东粮仓”和“高原蚕丝绸之乡”的美誉,名声远扬。如今,陆良县已列为云南省现代农业示范县、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县,成为全省粮食、生猪、蚕桑、烤烟生产基地。

通过兴修水利带来的山河巨变,陆良旧貌换新颜。笔者用陆良的同乡、同乐、陆凉几个古地名,撰成一副对联,赞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陆良巨变:

两千年历史,春去春来,自古积成江海,同乡传同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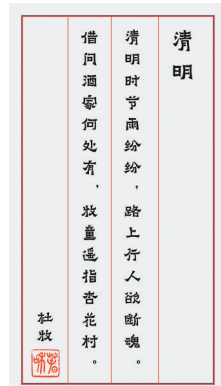
八百里平川,花开花落,如今安排河山,陆凉变陆良。

(作者单位:陆良县文联 图片提供:杨树德)

诗云南

千载清明千载雨

□耿嘉 文/图



杜牧绝句《清明》

今年的这个清明,又时断时续飘起细雨,正应了那句“清明时节雨纷纷”。避雨小亭中,找首诗来闲读,看到了清代张鹏翮的绝句《清明雨》:

清明雨应时,大地报春知。陌头杨柳绿,却待晓风吹。小雨不止,继续翻读下去,就有了一个不大靠得住的感觉:虽然不好断定是否自汉代造太初历定二十四节气时起,清明这个与久远的寒食节相融相连的节日兼节气,都会飘起细雨,但诗词中的寒食清明,有不少是为蒙蒙细雨所浸润的。

唐代,杜牧那首收入小学语文课本的七绝《清明》,营造了千古传承的清明意境。其他诗人的清明寒食诗中,也常见应节的雨丝雨点。王昌龄五律《寒食即事》中,开头四句就是:

晋阳寒食地,风俗旧来传。雨灭龙蛇火,春生鸿雁天。李山甫七律《寒食》前四句也说:柳带东风一向斜,春阴澹澹蔽人家。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千枝万枝花。晚唐韦庄的《长安清明》,起首就写:蚤是伤春梦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唐朝五代日趋兴盛的曲子词中,也吟唱起清明之雨:

清明节,雨晴天,得意正当年。马骄泥软锦连乾,香袖半犹鞭。花色融,人竞赏,尽是绣鞍来鞦。日斜无计更留连,归路草和烟。(薛昭蕴《喜迁莺》)

而后宋元明清,尽管没有去查找气象资料来佐证,这段时间清明寒食的雨,是不是多过汉魏隋唐,但这四朝诗词中的清明,是常见烟雨蒙蒙的。杨万里写有《清明雨寒八首》,其三、其四写道:今年寒食与清明,各自阴晴作么生。细雨千丝不成点,如何也解满檐声。

桃李一空春已归,不须更待絮飞时。闭门独咏寒食句,只有轻风细雨知。

有井水处就有柳树的柳永,所写《木兰花慢》上片就唱:折柳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细桃绣野,芳景如屏。倾城。尽寻胜赏,骤雕鞍绀马,乱穿花径。凤暖笙簧暖,万家竞奏新声。苏东坡也以《南歌子》吟哦:

日薄花房绽,风和麦浪轻。夜来微雨洗郊垌。正是一年春好、近清明……到了元朝,邵亨贞在《齐天乐 甲戌清明雨中感春》中写:“宿酒昏灯,重门夜雨,寒食清明依旧……”张翥因为清明雨收,写下约人出游的《东西马蹏春行柬平湿伯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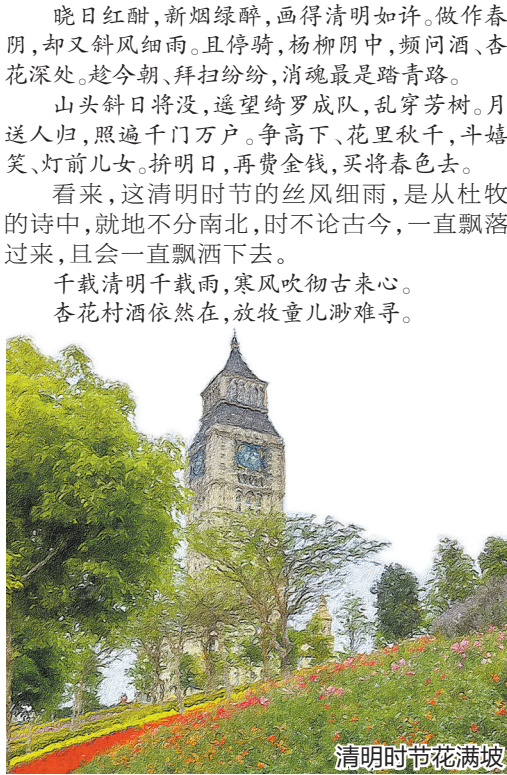
清明时节每多阴,杨树人家花满林。侵晓作收连日雨,赏春常负百年心。危翁一蒲塘暖,雉子斑斑麦陇深。为报能诗平处士,剩携芳酒共幽寻。进入明代,谢迁的《和雪湖清明雨中见怀》,从题目就知这清明的雨,颇易引人诗思:白鶯群飞下沓寥,顶丝披雨乱飘萧。草生园外池塘梦,麦秀田间巷路遥。吊古永怀寒食候,采芳欲上远山椒。湖头荷蒂牵新翠,分付舟人缓著篙。

明清之交,反清复明的斗士屈大均,面对清明时节阴晴不定的风雨,写下一首深沉的《壬戌清明作》:朝作轻云暮作阴,愁中不觉已春深。落花有泪因风雨,啼鸟无情自古今。故国江山徒梦寐,中华人物又销沉。龙蛇四海归无所,寒食年年忆客心。晚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乙未科状元刘绎,论诗主张“作诗不必规规唐宋,惟其真而已”,但他所写《路上》还是有明显的本本:

见杨柳色已伤春,听杜鹃声更恼神。正是清明时节雨,又来路上作行人。如说到云南,虽然山川节候、土风民俗与中原内地有很大差异,西汉被目为西南夷之中的滇王,在与汉武帝派出的使者初会时,曾自豪地问:“汉孰与我大?”但经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元跨革囊、明施屯田、清改土流的历朝开发治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都日益与中原内地融合并进。清代嘉庆十二年(1832年)的昆明戊辰科举人,著有《彩虹山房诗钞》《彩虹山房诗余》的谢琼,所写的一首清明词《绮罗香》,不仅能让我们看到云南的清明,也常有斜风细雨,而且可感到蕴含其中绵绵不绝的文化影响力、穿透力:

晓日红酣,新烟绿醉,画得清明如许。做作春阴,却又斜风细雨。且停驻,杨柳阴中,频问酒、杏花深处。趁今朝、拜扫纷纷,消魂最是踏青路。山头斜日将没,遥望绮罗尘,乱草芳树。月送人归,照过千门万户。寺高下、花里秋千,斗嬉笑、灯前儿女。拚明日,再费金钱,买将春色去。

看来,这清明时节的丝丝细雨,是从杜牧的诗中,就地生于分南北,时不论古今,一直飘落过来,且会一直飘洒下去。千载清明千载雨,寒风吹彻古来心。杏花村酒依然在,牧童笛声几渺难寻。



清明时荷花满坡